

读史札记

张钦楠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读史札记

张钦楠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史札记/ 张钦楠 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6

ISBN 7-5043-4010-3

I.读… II.张… III.文学-中国-当代-文集

IV.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18286号

读史札记

- | | |
|-------|---------------------------|
| 作 者: | 张钦楠 |
| 责任编辑: | 刘跃钊 |
| 封面设计: | 李丽娜 |
| 监 印: | 马 兰 |
| 出版发行: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电 话: | 86093580 86093583 |
| 社 址: |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图文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字 数: | 200千字 |
| 印 张: | 9 |
| 印 数: | 0001-2000册 |
| 版 次: | 2003年10月北京第1版 |
| 印 次: | 200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43-4010-3/G·1611 |
| 定 价: | 18.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章世鸿

本书作者张钦楠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早在中学时代，我们就在一起啃马克思主义书籍。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到了晚年，他仍然锐气不减，刻苦学习，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读史札记》。

我国写历史的专家学者不少。但是，读完钦楠的这本著作，你会感到它具有一般历史书所没有的新特点：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什么？针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教训，从中研究中国的改革之路。

当前对革命和改良问题，社会上有不少议论。中国的改革之路怎么走，也有不少议论。本书作者学习中外历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回答这些问题，至少是自己先弄清楚这些问题。

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不是作纯理论的探索，而是认真地对欧美及亚洲主要国家的革命史和改良史加以比较、分析，从中寻找共同的和特殊的规律。坦白地说，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位中国历史学家构建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工程。

这样的宏观性的研究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有一个极为开阔的视野，因而也使我们的头脑清醒过来。过去我们有些自我陶

读史札记

醉,说无产阶级革命如何伟大,而资产阶级革命如何有局限性,其实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的历史教训并不少。从我国情况看,建国后,农民就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文革”十年的结果是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作者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土木工程系。这个学校规定每个理工科学生每学期都要进修一门人文课目。他第一学年选读了法国革命史。国外图书馆资料比较丰富,也许由此而引起他以后不断研究各国历史的兴趣。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有关法国革命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法国革命确实有进步性,但到后期消极因素越来越大(有些像我国的“文革”期间),革命阵营分为好多派,鱼龙混杂,自相残杀,而且经济走向崩溃,最后导致拿破仑上台称帝。大革命的目的本来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但由于大革命造成长期的混乱和动荡,使法国上下都盼望有一个权威人物登台,他既能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又能捍卫革命的成果。这个人物果然出来了,那就是波拿巴·拿破仑。拿破仑称帝,经过投票,多数人支持他。他制定的法案和政策反而更适应民众的心意。这是历史性的讽刺,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从法国大革命联系到俄国革命来看,他的结论是:一、大革命后特别容易出现专制;二、但是专制也不能持久。在革命的狂热和专制过去后,人们吸取了教训,转向走改革和改良的道路(改革和改良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此后国家才逐步走上正轨之路。当然,革命的思想成果仍将保持。法国大革命留下的精神仍在影响法国,目前法国仍是欧洲各国中思想最自由的国家。一些新的思潮往往起源于法国。

此外,他在研究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偶然性和领袖个人因素起了极大的作用。

的确,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都强烈地打上斯大林个人的烙印。

序

在同样的体制下，如果不是斯大林当权，而是别的老革命当权，未必会如此残酷地杀掉那么多人；中国如果是刘少奇或周恩来当政，那么，“文革”断然不会发生。同样，中国走上改革的航程，邓小平个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必然性？当然有，那就是体制问题。斯大林问题揭露后，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而，全面地说，历史的进程应该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群体作用与个人作用的交叉，而一切必然性都要通过偶然性实现。这是辩证法的历史观。而我们过去太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似乎按苏联的道路前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其结果是导向新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苏联的灭亡，使这种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破产。

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历史研究领域打破老的框架。钦楠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对英国的改良史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是很必要的。由于受到苏联教材的影响，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的介绍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够实事求是。英国是一个偏僻岛国，但这个岛国从十八世纪起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强国。一个小岛带动了世界，这决不是偶然的。英国早在十三世纪就制定了《大宪章》，对帝王的权力加以限制。英国又是最早开展国际贸易、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经验说明，革命也可以采取非暴力的形式来完成，其效果并不比暴力革命差。改良和改革，可以完成暴力所难以完成的革命任务，而付出的代价较小。钦楠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也指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要比克伦威尔革命深刻得多，它所制定的《权力法典》奠定了现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它是不流血的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中都不加重视，只突出克伦威尔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者也开始摆脱老框架，有了新的眼光。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通史》（作者钱

读史札记

乘旦、许洁明)就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过去都称克伦威尔革命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最大的弱点是说不清谁是“资产阶级”。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尚未出现“资产阶级”,当然也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这本新著否定了老的提法。

这本通史的作者还对过去中国历史书籍的写法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历史书不好看,它把历史视为教条,似乎生活都是从条文里出来,而不是相反。于是,生活与故事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几根骨架,骨架上挂着几条干枯的肉丝,刚好符合条文的需要。如此写历史,历史就死了,所以应当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让它活生生地体现出来。”

这就是说,我们要克服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不要再用固定不变的原则去强加于史实,不再采取原则+例证那种僵化的方法,而应该从史实本身出发进行具体的生动的分析。

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而钦楠写的这本书显然是在努力摆脱老的研究史学的方法。无论他对外国史或中国史的研究,都努力让历史显示它的本来面目,并且从事实出发引伸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些问题他尚未形成自己的观点,他也把问题提出来同大家一起研究。

最后,我想说,《读史札记》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使我认识到自己历史视野的片面性和狭窄性,从而推动我从新的立足点重新开始学习世界史和中国史。

2003年9月14日

(本文作者章世鸿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长期任《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

我如何学习历史

——自序

我1931年出生在上海。祖父张寿镛在民国时期当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次长，后来辞官办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我出生时他已经不当官了。

我们家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住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的一个名叫“觉园”的弄堂里，隔壁是一座佛寺，是现在上海居士林和佛教协会的会址。我们和佛寺一湖之隔，湖中有九曲桥和湖心亭，湖边有假山和大树。在上海的闹市中，这是一片“净土”。

我们家的房子是建筑师按祖父的儒家家庭观念设计建造的，由一大二小三幢洋房组成。大的（三层楼）由祖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居住，小的（二层连体）由已结婚的父亲（长子）和二叔分住。这样，大家庭有分有合，体现了祖父“兄弟和睦相处”的理想。

在祖父的书房里，挂了一幅对联，是我曾祖父张嘉禄（在清朝当过御史大夫的官，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检察长）留给后代的家训：

舍诗书无以启后 子孙闻见至此 虽中才不致为非
唯孝弟方能持家 兄弟和睦相处 则外侮何由而入

这副对联说明我们家是尊崇孔孟之道的。

我出生在九一八事变那一年。以后又相继发生了七七和八一

读史札记

三事变。日本侵略军步步进犯，使我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耻辱。我4岁上学，1941年（10岁）小学毕业，考入了英国人办的虹口雷士德中学。那时每天上下学要经过外白渡桥，桥中央有一名刺刀出鞘的持枪日本兵，走过的中国人都要低头脱帽。我亲眼看到他经常对认为不够恭敬的中国人大打出手，心中充满了仇恨。

上学不久，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人接收了这所学校。祖父让我退学，转到我哥哥和堂兄上学的工部局华童公学。哪知去后发现日本人派遣了教师来开设日文课，祖父又让我们三兄弟转学到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金科中学。这样，仅是初中，我就一年换了一个学校。

祖父对日本侵略军是痛恨的。抗战初期，上海光华大学在大西路的新建校舍被日本军队炸毁，祖父对自己多年心血被付之一炬恨之切骨。同时，他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到毁灭的威胁，为此，他和郑振铎、何炳松等先生跑遍上海书肆去购置珍贵善本。现在，部分宝贵资料还保存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

祖父鼓励子女去内地工作。到四十年代初，除了我的五叔芝联（现在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外，几个儿子都去了四川内地，留下五个孙子、孙女由祖父母和我二婶教养。

祖父感到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他同时做了几件事，一是自费编辑和印行十卷本的《四明丛书》（生前完成八卷），把我们故乡宁波历代文人的著作收集编汇成集；二是在家里给光华校友讲学，用自己编写刻印的经、史、子学大纲作为教材；三是亲自对三个孙子传授《四书五经》。

那时我大哥元一15岁，二哥（二叔生）元二14岁，我（元三）12岁。祖父明知我们年龄还小，接受程度差，但他感到自己年月不多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迫的形势下，我们能吸收多少是多少。

序

这样，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就拿了祖父分发的书到他的书房去学习。每天念一段，提问或由祖父讲解，历时一年多。我就是这样系统地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教育。说老实话，当时实在懂得很少，印象较深的是《尚书》中周武王伐殷在牧野的誓词，只记得它气势磅礴，就好像指向日本鬼子一样；另外是孟子答梁惠王“王，何必言利，亦仁义而已……”的精彩对白。

同时，因为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英文，现在学校不教了，五叔芝联就把他的一本房龙写的《人类的故事》英文本给我读。我首次知道巴比伦这样的名字，但究竟功夫太浅，不能卒读。

祖父在抗战胜利前夕因伏案写作过劳，得糖尿病和肺结核去世。他去世前，一批光华校友来看望他，他留下了两句遗言：“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解放以后多次运动，都要我与他划清思想界限，我虽然也表示要如此，但始终对他感情笃深，难以忘怀。

在金科中学，我结识了同学章世鸿。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他和严廷昌、金福根、沈理阳等同学组织的读书会。我们读的是鲁迅的杂文、高尔基的《在人间》、苏联电影小说《列宁在十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吉也夫的《大众经济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后者是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里买到的。带回家里，就夹在祖父收藏的线装书之间。祖父那时藏书万卷，家里有11处藏书室，有我们充分“藏”书的地方。

读书会使我接触了一个新的世界。我知道了有苏联，有延安，有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知道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特别使我着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一下捕捉了我的信念。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时我14岁不到。

读史札记

抗战胜利了。我的父母亲从内地回来。父亲张星联，年轻时去美国留学，先后就学于恩多佛学院、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想在外交部门做事，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就到我外祖父开设的一家印刷厂当经理。这家印刷厂为农业银行印钞票，开始设在缅甸仰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工人们把机器拆了，沿滇缅公路搬迁到四川乐山，很不容易。解放后，他被分配到文化部外文局当文字翻译，一直工作到84岁去世。

我那时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要和平、民主和自由。父母亲担心我要出事，就乘我二叔去美国担任国民党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之际，让他把我带到美国去念大学。那时我16岁。

我到美国后，先考进美国宾州匹兹堡一家叫华盛顿杰弗逊学院的“小大学”。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英文文学课。第一学期学的是小说，老师特别喜欢海明威和康拉德的作品，分析起来滔滔不绝，另外还指定我们阅读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第二学期学诗，用的是美国新批评派编的《理解诗歌》一书。我当时并不知道新批评派的分量，只是背诵自己喜欢的诗，从密尔顿到弗洛斯特，背了不少。

在美国稍许熟悉了环境后，我就向麻省理工学院报名转学，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从大二开始，学的是土木工程学。

很多年后，有人问我：你在“麻省”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它的人文课”。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美国负有盛名的理工学校。但是它的人文教育特别强调，对本科生要求每学期必修一门人文课，期终还要写一篇论文。我在第一年(大二)学的是“民主思想史”；第二年(大三)是经济学(用萨缪尔孙的教本，并由他亲自来上大课)；第三

序

年(大四)是哲学。这样,我就在美国的最高学府接受了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

现在回想起来,最有意思的是在麻省头一年的学习。那时,我不懂规矩,既然学的是“民主思想史”,我就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学期终了,老师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不懂规矩。原来写论文先要选题,题目要经教授同意,并指定一定数量的参考书。他对我笑笑说,看来你脑袋不错,但是再好的脑袋也要按规矩办事。我以为要不及格了。哪知他给我一个P+(学校的分数制是H、C、P、L四等,P+相当70分左右),出乎意料之外。第二学期,就赶快找教授报题。我报的是法国大革命。他听了大摇其头,说这个题目不好写。我说,中国正在闹革命,所以我想多知道些法国革命的历史。他勉强地给我开了几本参考书。我就钻到附近哈佛大学新开张的、有空调的拉蒙图书馆去啃资料,写了篇东西上交。其中我引证资料说法国革命前国王和贵族杀的人比后来革命派杀的国王和贵族要多。我估计教授看了势必摇头,打个低分。哪知在学期快结束时,来了位德国新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竟大为赞赏,给了个H+。有一次在学校走廊见到我,还说,“看到你把权威‘划’了,很痛快”。我于是体会到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我在美国四年,所见所闻所学仍然没有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也有迷惑的时候,主要是感到美国个人主义太根深蒂固,不仅人人奉行,而且还在理论上肯定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使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否改造全人类(至少是美国这部分人类)有所怀疑。

1951年,我拿到了工学士的学位,下一步往何处去?有一位老师和我谈话,说我年纪太轻(当时20岁),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最

读史札记

好是先工作几年，再读一个硕士学位。他的劝告，从专业角度来说，确实是很恰切的。也有一位同学，有一天一本正经地把我拉到走廊上，说你万万不可回去，他们（指共产党）会因为你在美国念过书就把你关起来，甚至杀掉。那时，抗美援朝已经打响，中美间的交通随时可能断绝。我归心如箭，生怕被截留在外乡。中国的革命吸引了我，当年在日本占领下的耻辱还历历在目，我希望亲眼看到并亲身参与中国的现代化，于是决定马上回国。

我们乘船从旧金山到香港，由英港警察押送到罗湖，再坐火车到广州。我在广州街上第一次看到的中国报纸上，登载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我在上海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从政治到业务，都从最基层做起。这以后，就是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四清，然后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奇怪的是，在文革以前，我在这些运动中，居然都没有被直接触及，而是“跟”过来了。然而，我在精神上始终处于谨小慎微、高度紧张的状态，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对象，因为我的出身是封建官僚（祖父）和资产阶级（父亲），从小到大，受的是系统的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文革时期，提出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好像就是针对我说的。

在文革中，我没有像一些留学回来的专家那样，被打成“特务”、“间谍”，既不够资格做“走资派”，也不够资格当“反动权威”，但是在我当时的单位（西北建筑设计院）里，“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我在文革前被任命为副院长），受到一次全院性的大字报批判，然后被下放到砖瓦厂劳动。

在下放的前夕，我整理自己的行装，发现了一本从美国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全集，是由一位美国进步画家做的插画本。我是在波

士顿的一家名为进步书店的店家买的，还得到了美国老板的优惠，以表示对上海解放的庆贺。我把这本书一页页地撕去，付之一炬，以表示与过去的决裂。下去以后，我感到空前的轻松，一同下去的“出身不好”的“同志”编了一首顺口溜——“三顿饭，一个澡，晚上睡得好”，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然而，我仍然觉得“灵魂深处”并没有发生革命，脑子里的“封”还是“封”，“资”还是“资”。

改革开放以后，我被调回设计院，在1980年调到北京中央机关。这以后的几年，我的“官运”亨通，当上了城乡建设部的设计局局长，后来又被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的秘书长和副理事长。我体会自己是一个“在恰好需要的时间恰好在场的人物”。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时机，我的学历、经历以及外语能力，使我能在打开建筑界的国际关系中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从1994到1999年，我被建筑学会委派与美国建筑师学会的代表共同担任国际建筑师协会的职业实践委员会联合书记，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建筑师实践的国际标准，在1999年国际建协的代表大会上被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由于我的这个和其他一些活动，我先后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的建筑师学会（协会）推举为名誉会员或名誉资深会员，甚至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艾利斯市封为“名誉市民”。在我正式退休的时候，回想起自己50年前从美国回来时的理想，感到自己还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一条使自己对国家有用的路。

然而，我离休以后，仍然感到自己有件大事没有完成，这就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在我的“专业”方面，我已经“交差”了，以后所做，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仍然感到欠了债，欠我的祖父、欠我的父母叔婶、欠我的老师，以及欠在各次运动中

读史札记

“帮助”过我和我“帮助”过的同志。在我去见上帝(或马克思)之前我需要进行学校中的人文课的学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事实上,中国近期的发展,也时时刻刻给我提出了许多新的疑惑和问题,例如:

——革命与改良,何者为佳?像瑞典那样搞改良,社会也富起来了,革命是否代价太大了?

——革命有没有规律?如何掌握这个(这些)规律?

——市场经济的开放,就是承认了利润动机,这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差别?

——国营企业(不论中外)为什么搞不好?

——现在不反资本主义了,是否反封建成了主要任务?

——中国旧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反封建到底要反什么?

——怎样看待个人主义?它是“万恶之源”,还是“进步动力”?

——怎样看待学术自由?创新思维和批评思维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些问题,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从历史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去认识和解决,需要了解其起因和发展规律,需要了解前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和经验教训,也就是说,需要从历史看到今天和明天。

我于是决心,在有生之年,认真地学一些历史。

我学习历史,并不想按部就班地去学,而是从自己存在的问题出发,到历史中去找答案。

我把自己首批学习的问题归纳为四项:革命、改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对革命问题,我选择了从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历史中去找一些共性。

序

对改良主义，我选择了英国议会政治、日本明治维新、瑞典福利经济、罗斯福“新政”，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去学习和思考。

对封建主义，我选择了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黑暗时期”，从中去认识当时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扩大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我从它的形成历史、思想基础、“新经济”和全球化等方面去理解。

在学习中，对每个题目，我除了选择几本重要的参考书外，还利用互联网这一巨大的资源，许多人物、事件、问题的资料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取得。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 Google 及中国“百度”等网址下载了几百条单项资料。此外，历史小说和电影也甚有帮助。

我把自己的学习方法称为 4X4，即对每一个“小”题目，横向地选择四个典型来形成组，然后用四个组来对“大”题目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一般可以形成一定的见解，当然是很粗糙的见解。

我写学习札记，目的仅仅是理清思想，不想当一名历史学家，也不想著书立说，所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到自己 and 恩格斯的一部著作未能付印时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我的札记写在电脑上，老鼠是无法“批判”的，但是我衷心希望能得到一些和我一样在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批判和指正。

2003 年 9 月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 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章世鸿(1)
我如何学习历史(自序)…………… (5)

第一辑 学习四个国家的革命史

- 美国革命解决了哪些问题…………… (3)
法国革命如何熔铸了她的民族性格 …… (26)
俄国革命是成是败 …… (46)
中国革命取得了什么经验教训 …… (65)

第二辑 学习一些国家的改良史

- 英国议会政治的历史作用 …… (91)
日本明治维新的曲折道路…………… (108)
欧洲福利经济的前因后果…………… (123)
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时代意义…………… (137)
对革命和改良的一些认识…………… (150)

第三辑 论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历史与“黑暗时期”

- 论欧洲的“黑暗时期”…………… (159)
论欧洲的封建主义…………… (174)
对中世纪欧洲及“黑暗时期”的几点认识…………… (186)